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红楼梦》研究论丛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红楼梦》研究论丛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frac{1}{4}$ 印张 226,000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80册

书号：10091·762 定价：0.86元

目 录

论《红楼梦》中的社会环境·····	傅 继 馥(1)
有关《红楼梦》的几个问题·····	刘 德 鸿(28)
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兼批“四人帮”评“《红》”·····	姚 国 中(47)
奴隶、奴才及其它	
——兼评晴雯、鸳鸯·····	汪 征 鲁(60)
论探春·····	应 必 诚(79)
论尤三姐·····	杨 一 兵(100)
试论晴雯·····	张 永 莹(107)
贾宝玉与甄宝玉	
——《红楼梦》里两个互相对立的人物·····	王 晓 家(127)
谈谈贾宝玉的《姽婳词》·····	王 宗 成(148)
谈《红楼梦》的艺术技巧·····	何 宁(154)
《红楼梦》结构试析·····	王 宜 山(181)
雪芹诗话	
——《红楼梦》诗论的辑录、注解和诠释	
·····	曾保泉 顾 平 旦(197)
“红学”漫拾·····	孙 逊(216)
《红楼梦》原本是一百零八回吗?	
——与周汝昌同志商榷·····	王 思 宇(223)
“寅卯”说是可信的吗?·····	洛 地(236)
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吗?	
——学习《论庚辰本》管见·····	李 少 清(244)

-
- 关于《红楼梦》脂砚斋评的作者问题……………韩 连 琪(259)
- 从敦诚等人的卒年试谈《红楼梦》后四十回
的作者问题……………萧 立 岩(278)
- 清代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考略……………刘 操 南(287)
- 关于永忠吊曹雪芹的诗句
和弘杳的批语……………郭 树 文(310)
- 张彦伦的“红楼杂咏”……………陈 廉 贞(320)

论《红楼梦》中的社会环境

傅 继 馥

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复制各种自然环境，包括复制有太阳风的月球环境。文学家则在作品里复制形形色色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化了的自然环境。《红楼梦》复制了几乎整整一个时代，把那个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连同它特有的气压、温度、色彩、音响及其变化，一齐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使今天的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和认识一个永不复返的重要时代。这大概是一个古代作家在典型环境描写方面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吧！

文学理论关于环境与人物形象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只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揭示了文学中典型环境的实质，科学地论述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第一次把艺术典型的学说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就象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皮肤一样，人也不能超越环境而存在。在作品中，没有人物的环境是不存在的，同样，没有环境的人物也是不存在的。在评论中，不分析环境的典型性，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分析人物的典型性。在《红楼梦》研究中，关于典型环境的分析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同人物形象分析相比，显得不相称。而环境分析的薄弱反过来就必然影响人物分析的进展。《红楼梦》研究中的这种情况不是孤立的，在我

们的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的研究同样也是比较薄弱的一环，这方面的论著特别少，就是对典型环境这一基本概念的看法也还有分歧。

“四人帮”在炮制反党“红学”的时候，利用了这一薄弱环节。他们扯拾一些耸人听闻的宫廷传闻，把雍正夺嫡曲意解释为儒法斗争，充当《红楼梦》的政治背景，又把这一政治背景充当典型环境。宣布说：曹雪芹“采用了这种曲折的隐晦的方式，鞭挞了雍（正）乾（隆）的尊儒反法路线的黑暗统治。”（柏青《红楼梦与封建末世的政治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而‘真事’，亦即雍乾时代的政治斗争，也就被作者巧妙地熔铸在整个艺术形象中了。”（柏青：《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这样，既把《红楼梦》的典型环境说成是雍正乾隆的尊儒反法路线的黑暗统治，又把典型环境和时代背景也完全搞乱了。

叙事类文学中的环境，是指作品中描写出来的、围绕人物、促使人物行动的一切外在条件的总和，其中包括自然环境，而以社会环境为主。社会环境主要是指特定时代特定范围内的阶级关系。环境应该是在作品中描写出来的，而不是未经描写的产生作品的时代背景。作为时代背景的社会生活是作品描写的对象，也是检验作品中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客观标准；但并不是环境描写本身。恩格斯在著名的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正是根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时代背景，检验出《城市姑娘》的环境描写是不典型的。正因为环境是在作品里展现的，所以才可能是具体的独特的；即使是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作品，时代背景相同，但是环境描写却永远不会重复。《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作于十八世纪四十、五十年代，都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

但是，它们的环境描写却具有何等不同的特点啊！

关于《红楼梦》中自然环境描写将另文论述，这里只谈社会环境。它大体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这就是我们进行环境分析的主要范围。

其一、对社会环境的直接描写，包括由作者出面和通过人物之口的描写。这是我们分析社会环境的重要依据。近代欧洲小说常由作者在小说开头用较大篇幅对环境作集中描写，如《高老头》第一章中对伏盖公寓的描写。《奥勃洛摩夫》开头用好几章描写围绕奥勃洛摩夫性格的社会环境。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则极少离开情节的发展集中地描写环境，大多是分散地穿插和结合在情节的进展中，如关于农村情况，作者写到甄士隐的家乡，乌进孝讲到黑山村一带，刘姥姥讲到京郊农村等，这就需要把分散的描写，综合起来分析。

其二、对社会环境的概括性叙述，也包括作者出面和通过人物之口的概括。如贾雨村关于正气邪气的议论，实质上是作者对社会环境所作哲学上的概括。门子关于护官符的说明是从政治上作的概括。《好了歌》和注对封建阶级急剧没落和分化的咏叹，实质上是作者用哲理诗的形式所作的艺术概括，冷子兴演说是对贾府现状的概括，《飞鸟各投林》等曲是对贾府未来命运的概括。因为是作者自己作的概括，就比较准确，而且能直接表现环境描写的创作意图，因而值得重视。但是，它又是概括，缺少形象描写所具有的客观意义，而比较多地表现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因此，不能用它来代替今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分析和概括。

其三、典型的人物形象既是某种阶级关系的代表，因而从典型环境的角度看，不但人物之间互为环境，而且又构成

总的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离开晴雯、刘姥姥等一批下层人民的形象，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图画就不可能是完整的。而如果离开一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市民意识的人物形象，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就缺少社会环境的依据，而变得不可理解。

如果说，在前两种情况中，环境分析不容易和人物分析相混淆，那末，在第三种情况中就遇到了疑难。人物描写在哪里截止？环境描写又从哪里开始？两者错综交叉，很难划出一条截然的界线。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正是把对象分解成若干因素，以便对各种因素进行单独的考察。因此，环境与人物在作品中虽然常常浑然一体，在理论上却又是可以分解、也必须分解的。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理解进入对《红楼梦》社会环境的分析了。

（一）

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统治和影响下，《红楼梦》评论中出现了许多脱离作品实际无限上纲的论调。说《红楼梦》描写的是农民起义高潮的时代，即是一例。方岩梁就胡说从《红楼梦》中“看到了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情景”。（《大有大的难处》、《红旗》1974年第4期）有的同志也说，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或者说，“劳动人民‘抢田夺地’，揭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动摇着四大家族的统治。”有什么根据呢？有的按时间历数曹雪芹在世期间小规模的农民斗争。但是，中国疆域辽阔，小规模的农民斗争，此伏彼起，常常史不绝书。如果罗列次数而不作综合的分

析，就足以说明是高潮时期，岂非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始终处在农民起义高潮之中？再说，即使证明了作者生活在农民起义的高潮时期，也并不等于就是小说里描写的社会环境。在小说中有什么根据呢？无非是第一回的几句话：“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抢田夺地”诚然是农民起义，但是，又说甄士隐把田庄都变卖了。岂有在农民起义地区，地主还能自由地进行土地买卖的？只能说，农民起义很快就被镇压，封建秩序随即就恢复了。这件事在时间上距离情节的开端还有五、六年光景。它只是小说的整个序曲中一个高亢激越的音符。而且，它只是甄士隐家乡一个局部地区的情况，远离故事演出的主要地点——京城。除了甄士隐外，无论是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还是其他地区，都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且看秦可卿同王熙凤在梦中筹划的“常保永全”的方案是，“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这是一个防朝廷抄家的方案，而不是防农民起义的方案。根据清朝法令，抄家不涉及祭祀产业，而在农民起义时那里还能“子孙回家读书务农”呢？

第十五回，贾宝玉等送殡到郊外铁槛寺，路过一个小村庄。这在小说里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写贾府贵族在大观园外面直接同农民群众相遇。他们以贵凌贱，作威作福，而农民的反映怎样呢？“早有家人将众庄汉撵尽。……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宝玉、秦钟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段，岂有不爱看的？”不过是像看热闹新奇的戏文那样“爱看”，既不是如续书改的

“几疑天人下降”那样的卑屈，可是也看不出有什么阶级意识的觉醒。略有着墨的是一个村庄姑娘，当贾宝玉玩弄纺车时，她不顾封建等级森严、贾府的气焰薰天，敢“跑了来乱嚷：‘别动坏了！’”宝玉陪笑以后，她说：“你们那里会弄这个，站开了，我纺与你瞧。”流露出对纺线劳动有几分自尊，对五谷不分有若干不满，但也仅此而已，哪里有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期的气氛和烙印？

黑山村一带情况是结合乌进孝交租的情节侧面叙述的，这一节在《红楼梦》描写的农村情况中具有面上的代表性。不仅因为它包括“方近一千三百里地”，更重要的是它在作品中表现了影响人物的典型环境的作用，它标志着贾府经济危机的逐渐逼近，在贵族主子的心上投下了抹不掉的阴影：贾珍当场就说：“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遑遽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又深刻地反映到贾母的饭碗里，使老祖宗的红稻米饭只能“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裕也不能的。”黑山村一带的农民确实已经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是从深重的灾难到爆发农民起义，仍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曾有科学的论述，认为革命形势必须具备三个主要条件：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而从革命形势到革命爆发，还需要革命阶级能够发动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黑山村农民的灾难虽然深重，也还没有到柳妈所说“连草根子都没了的日子”，也还不能说是超乎寻常的加剧。更不用说其他条件了。所以，乌进孝押着几万斤货物，携带几千两银子，从山坳海沿子到京城，走了一个多月，却还能一路平安无事，也就不奇怪了。

直接来自农村的“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的刘姥

姥，则是工笔描绘的庄农人家的形象。同黑山村在一起，仿佛点与面似地结合起来，组成了社会环境描写中农村这个侧面。

刘姥姥自己也参加部分劳动，经济地位大致相当自耕农。刘姥姥进荣国府，游大观园，半是庄家人的本色，半是女清客的奉迎。一方面，用庄家人的思想情绪、生活习惯处处比照着贾府的衣食住行，生动地表现了茅屋中人与宫殿中人的想法何等天悬地隔！一方面又是迎合凑趣，念诵些感恩戴德的话语。在她的言行中，怎么可能闻到农民起义的火药味呢？在她周围的庄家人，又有“那一个不是老老诚诚的，守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呢？她编造的农村新闻，也只是些女孩子雪天抽柴的无稽之谈和善有善报的迷信传说，而不是鱼腹帛书、篝火狐鸣之类的造反舆论。

有些评论为了论证阶级斗争的尖锐，竭力夸大几十条人命案，强调从几十条人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有些公开出版的小册子就热中于编制“四大家族虐杀的人命表”。这些人命表根本经不起查对，有的表中关于前八十回列了十六、七条人命。其中只有冯渊、瑞珠、张金哥及其未婚夫、金钏儿、鲍二家的、尤三姐、尤二姐、晴雯九人是直接或间接被四大家族迫害而死。其他如鸳鸯的母亲、姐姐、赵国基、可人、王熙凤的陪嫁丫头等，或因病而死，或死因不明，怎么就能臆断是被虐杀的呢？在生活中，贵族虐杀人命，是阶级压迫的残酷性的一种表现。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必须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才有价值；数学中的无穷大的符号，在文学上的价值只等于零。曹雪芹揭露封建贵族的阶级压迫，既有肉体上的残杀，更侧重精神上的统治和迫害。贾政标榜“宽柔以待下人”，王夫人为金钏之死独自垂泪，说：“比

我的女儿也差不多。”其实质固然是虚伪的，但是，也反映了阶级斗争低潮时期，用宗法制温情掩饰的封建压迫的特点。如果写贾府杀人如麻倒反而与社会环境的特点不符合了。

曹雪芹又饱含同情塑造了一批家内奴隶的形象。这批替贵族做家务和供装饰豪华生活用的奴隶，戴着奴隶制古老而沉重的枷锁，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这是封建压迫的野蛮的补充，是“体仁沐德”的贾府内阶级压迫的活生生的证据。家内奴隶的革命性一般不及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农奴。她们长期来忍气吞声地忍受着被奴役被侮辱的生活，现在有所觉醒开始反抗。我们既要充分予以肯定，又要看到这些反抗是自发的、个人的、初步的，自杀、出家等更是消极的反抗方式。而且，家务奴隶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无力形成一种革命运动。即使将来斗争发展了，也只能是农民斗争的补充，或者成为市民斗争的侧翼。那种认为奴婢的反抗动摇了贾府的统治，促使其崩溃的说法，在理论上既不科学，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总之，《红楼梦》关于农民的描写确实不多，只是简略地勾画了一个侧影，作为社会环境的一个侧面。但是它写了贾府的“富贵温柔乡”主要建筑在高额田租上，黑山村等收成的丰歉直接反映到贾母的饭碗，这就表现了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本阶级。小说描写的农村是呻吟的村庄，而不是燃烧的土地；农民阶级还是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侧影，而不是揭竿而起叱咤风云的巨人。当将来他们逐步挣脱斗争的低潮状态，扬起起义的大纛时，义旗上将闪烁出历代农民起义所没有的时代色彩，就如一个世纪以后的太平天国起义那样。

(二)

在《红楼梦》的社会环境中，以贾府为主的贵族社会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准确地分析四大家族就成为分析社会环境的重要环节。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历史事变和观念与物质经济生活条件之间，常常有许多偶然因素造成复杂的折光。以往的小说描写常常停留在这些折光面前。曹雪芹的历史观当然也只能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对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已有所注意，《红楼梦》作为时代的史诗对这方面确实比一般的小说有比较多的描写。这一意义深刻的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生活中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宗法制的温情脉脉的纱幕的褪色，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作用逐渐明显。《红楼梦》的这一特点，为我们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提供了方便。

维持贾府的豪华淫逸生活的，主要是庄田的高额地租。宁国府还有八九个庄子，黑山村只是其中一个。荣国府有“八处庄地”，田地比宁国府“多着几倍”。清初统治者用暴力圈占土地，竟达当时全国耕地面积五百余万顷的三十分之一，称为旗地，由皇室、王公、勋臣等瓜分。“国初勋戚，皆给庄田，以代廩禄。”被先皇称为“勋业有光昭日月”的荣宁二公，当然也攫取了一份被血水染红了的土地。他们逼迫大批百姓成为农奴，设立庄头，役使耕种。用皮鞭把生产关系从原来的封建租佃制驱回到农奴制，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倒退。但

是，生产力的发展终究是不可抗拒的。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大部分旗地的经营方式就不得不由“满洲籍家仆资生”改为“资佃耕种，收取租息”。即由农奴制恢复为封建租佃制。而属于王公贵族的庄田在旗地中转化最迟，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纪末，封建租佃制才成为主要经营方式。（参见杨学琛：《清代旗地的性质及其变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那已经是曹雪芹逝世以后的事了。荣宁二府庄田的生产关系怎么样呢？王熙凤曾多次提出要把奴仆焦大、五儿等打发到庄子上，作为惩罚。“五儿吓的哭啼啼，给平儿跪着”求情，充满恐惧的泪眼仿佛望见了庄头的皮鞭象蛇一样晃动。可见，贾府沿袭了清初发遣罪犯到庄田服劳役的成规，庄田上还有农奴。再看第五十三回中交给宁国府的地租单子，除了大量谷物等实物地租外，还有许多贡物，表明有严重的封建义务。关于折银二千五百两，我同意不是货币地租的说法。赈单上说明是“外卖梁谷牲口各项”的“折银”，是庄头征收实物后按主人命令折变成银子的。所以贾珍说：

“我算定至少有五千两银子。”更有力的理由是，既然王公贵族的庄田迟至曹雪芹逝世以后，封建租佃制才取代农奴制成为主要经营方式。宁国府怎么可能采取封建地租的最后一种形式——货币地租呢？

综合起来看，贾府的庄田大体上还处在从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过渡状态。而从全国来看，不但封建租佃制早已是普遍形态，而且有一小部分已转向商业性的农业经营，一部分农民也已从封建的主奴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农业雇佣劳动者了。这在《红楼梦》中也有一定的反映。在这种情形下，贾府庄田上的生产关系就很突出地暴露了落后性。

贾府贵族住在繁华的大城市里，享受着商品经济和进口奢侈品所提供的豪华生活，把庄田的经营管理完全交给庄头。任凭庄头依仗贵族主子的权势，横行霸道，而自己则“足不及田畴，面不识佃户，一任纪纲仆人所为。”只是到了年关节边，贾珍在深宅大院里“靸着鞋，披着猢猻大裘”，“倒背着两手”，连地租账田单也还得由别人捧着展开给他查看。如果说，资本家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展上还有一个积极作用的话，那末，贾府贵族则完全是多余的寄生阶级。

如此落后的生产关系必然造成生产力的倒退。这在交租帐目单上也已经有了反映：虽经勒逼，田租仍然比原来定额少了一半。后来，王夫人又说：“这一二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了。”乌进孝驱策庄丁驼运数万斤租谷杂物，在雨雪泥泞的路上步履十分艰难，好象驮着的就是那个不堪负担的落后的生产关系。

眼看经济危机一步比一步逼近，贾府主子是否有意改弦换辙呢？不。宁国府当家人贾珍横眉竖眼地对庄头说：“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荣国府的当家主妇王熙凤则主张：“象咱们这样人家，必得置些不动摇的根基才好；或是祭地，或是义庄，再置些坟屋。”马克思说：“一切古老国家都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是所有权的特别优越的形式，并且把土地的购买看作是特别可靠的一种投资。”（《资本论》第3卷第732页）荣宁二府当家人梦想维护和扩大的主要是庄田制，这是已经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落后的一种。维护加倍的落后就是加倍的顽固！

四大家族又是封建性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代表。薛家的皇商资本来自“内库帑银”，直接向户部“支领钱粮”，“采办杂料”，供应宫廷消费，而薛蟠作为经营的主人竟然“一应经纪

世事全然不知”。这是一种利用封建特权进行的商业活动，封建性十分浓厚。薛家的百万财富主要是从这里来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商品买卖，如第四十八回薛蟠随同张德辉到外地贩运商品，贱买贵卖，也没有超出商业活动的古老的范围，根本不同产业资本相结合。

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主要的自然取决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但是，商业资本也可以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商业大革命就起过这样的作用。相反，如果商业资本不同产业资本结合，就会以保存旧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生产越是不发展，货币财产就会越是集中在商人手中。”“在商人资本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的地方，古旧的状态也就占着统治地位。这个结论甚至在一个国家里也完全适用；在那里，比方说，纯粹商业城市，比之工业城市，就和过去的状态有更多的类似的地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65、366页）薛家集中了“真珠如土金如铁”的惊人财富，保存着浓厚的封建气息，都可以从上述经济规律中得到理论上的解释。

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虽然已有一部分商业资本同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但是，大量的商业资本却操纵在大官僚地主手中，凭借政治特权，经营封建性的商业和高利贷，加强了大官僚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结合。大官僚地主高士奇、徐乾学、和珅等是典型的例子。高士奇经商的资金在一百四十万两以上。和珅则有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千万两。雍正自己也开过当铺。曹雪芹的父亲曹俯被抄家时，也被查获放出银子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红楼梦》写薛家有当铺，又四次描写王熙凤无孔不入地进行高利贷盘剥。“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

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紧紧地寄生在它上面，使它穷乏。它吮吸着它的膏血，破坏着它的神经，强使再生产在日益悲惨的条件下进行。就是为了这个原故，所以引起了大家对于高利贷的厌恶，这种厌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最高点。”（《资本论》第三卷第699页）林黛玉、史湘云等对薛家当铺的讥刺，就是这种厌恶情绪的天真的流露；而王熙凤“落了一个放帐破落户的名儿”，则是受到这种厌恶情绪的强烈的谴责。

王熙凤的“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王家是十八世纪上半期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产物。清初严厉的海禁从康熙22年（1683）开始开放，康熙24年（1685）于粤、闽、江、浙设立海关，与外国通商。自康熙59年（1720）起，由朝廷指定特权商人，称为“官商”，垄断对外贸易。乾隆22年（1757）又限制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同时设立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拥有对外贸易的特权，凡外来的一切人员、船只、货物及纳税等都由保商承保。小说虽未说明王家的职衔，但是它既受朝廷的委派，又拥有对外贸易的特权，分明属于封建官僚垄断和买办的性质。

综上所述，四大家族维护庄田制等古老的剥削方式，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禁的一度松弛，又采用“时新”的但同样反动的剥削方式。四大家族以官僚地主为主，又结合着封建性商业、高利贷和官僚买办资本的活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主要障碍，这里有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深刻的时代烙印。

经济上的腐朽和反动决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腐朽和反动。